

• 百 家 园 •

历代医家对情志病的认识

黄 涛* 陈金亮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石北路 385 号, 050091)

* 通讯作者: hhtt99@sohu.com, (0311)88609688

[摘 要] 《黄帝内经》建立了中医防治情志病证的理论框架;《金匱要略》中许多条文涉及到情志异常;隋唐时期是情志学说的初步形成阶段;宋代陈无择明确提出“七情”的概念;金元时期是情志病学术思想的繁荣时期。明代医家对情志病的认识表现出一定的广度;清代医家对情志病的认识内容非常丰富,涉猎更加广泛。

[关键词] 情志病;黄帝内经;金匱要略;七情

中医对情志病的认识历史悠久,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情志病的防治。现代社会医学模式已由原有的生物医学模式向心身医学模式转变,情志作为重要的致病因素已经被现代医学理论所证实,情志致病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1]。充分挖掘古代医籍中的相关内容,可以更好地指导我们认识和治疗情志疾病。

《黄帝内经》建立了中医防治情志病证的理论框架。《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心“在志为喜,喜伤心”;肝“在志为怒,怒伤肝”;肺“在志为忧,忧伤肺”;脾“在志为思,思伤脾”;肾“在志为恐,恐伤肾”。在《灵枢·本神》中指出:“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腠脱肉,……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悵乱,四肢不举,……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说明了情志为五脏所主,五志太过会伤及五脏,从而导致形体的疾病。五脏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五脏功能正常可产生正常的情志活动;反之,五脏功能失调也必然导致情志的异常改变。如《灵枢·本神》说“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素问·举痛论》指出:“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说明情志失度,可致人体气机紊乱,干扰正常的升降出入,从而导致疾病发生。《黄帝内经》强调心在情志活动中具有主导作用,许多情志活动影响到人的心神,人的心神不稳,就会影响到脏腑或身体的机能。如《灵枢·口问》指出:“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在情志病的治疗方面,《黄帝内经》采用祝说病由,开导劝慰和情志相胜、以情胜情的方法治疗。祝由疗法出自《素问·移精变气论》,是医生根据患者的客观表现对其祝说病之由来,分析病情,使患者改变不良的心理状态,调整紊乱的气机,从而治愈疾病^[2]。祝由是中国古代心理治疗的重要方法,类似的内容在其他篇章中也有记载,如《灵枢·师传》云:“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情志相胜是《黄帝内经》运用“比类取象”的方法,根据五行相克的理论,用一种情志去纠正其所胜的另一种情志的治疗方法。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

此外,在预防情志致病方面,《黄帝内经》秉承了先秦诸子“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清心寡欲”等思想,从医学的角度提出了保持心神宁静,思想清静,减少物质欲望是预防情志致病的一个重要原则^[3]。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素问·痹论》说:“静则神藏,躁则消亡。”《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清静则生化治,动则苛疾起。”论述了清静养神能使人体的生理功能保持正常状态,从而避免疾病的发生。

汉代张仲景在《金匱要略》中许多条文涉及到情志异常。主要有百合病、梅核气、脏躁、奔豚、虚烦不眠、乳中虚等。对建立情志病临床辨证体系有重要贡献,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如《金匱要略

·奔豚气脉证治》曰：“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不仅指出了奔豚气的病因，而且描述了奔豚病的主要症状，并专门创立了奔豚方。

隋唐时期，是情志学说的初步形成阶段。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说：“怒气则上气不可忍，热痛上抢心，短气欲死不得息也，恚气则积聚在心下，心满不得饮食，忧气则不可极作，暮卧不安席，喜气即不可疾行，不能久立，愁气则喜忘不识人语，置物四方，还取不得去处。”^[4]孙思邈效法《黄帝内经》，从七情内伤立论，指出“凡远思强虑伤人，忧愧悲哀伤人，喜乐过度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戚戚所患伤人”。并进一步强调“怒气、愧气、喜气、忧气、愁气，此之为病，皆生积聚”。指出长期不良情绪刺激，如心情抑郁、思欲无穷、喜乐过度等，都会导致积聚的产生。他归纳了七情所致的各种证候，即“喜气为病，则不能疾行，不能久立；怒气为病，则上行不可当，热痛上冲心，短气欲死，不能喘息；忧气为病，则不能苦作，卧不安席；恚气为病，则聚在心下，不能饮食；愁气为病，则平居而忘，置物还取，不记处所，四肢浮肿，不能举上……”。他特别强调性情调摄，谆谆告诫“可不自摄养而驰骋六情”^[5]。

宋代陈无择结合《黄帝内经》“五志太过致病”学说，提出了著名的三因论^[6]，明确提出“七情”的概念，把情志病的病因明确为七情，突出强调了情志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说：“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为内所因”。

金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情志病学术思想的繁荣时期，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百家争鸣，深入阐发情志病的病机。在理论上七情学说日益成熟，在实践上情志相胜疗法广泛应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情志病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

刘完素十分重视情志致病，并提出了“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著名论点^[7]。他认为，“五藏之志者，怒、喜、悲、思、恐也。若志过度则劳，劳则伤本藏，凡五志所伤皆热也。”说明了情志与疾病的相互关系。他还从心立论，心主神，属火，认为五志化火生热，关键在于心的作用。

李东垣在脾胃学说中很重视心理因素。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说：“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在《脾胃论·安养心神调治脾胃论》中提到：“凡怒、忿、悲、

思、恐、惧皆损元气。夫阴火之炽盛，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故也”；“心君不宁，化而为火”。

朱丹溪也很强调情志病的治疗^[8]。在《丹溪心法》中说：“五志之火，因七情而生，……宜以人事制之，非药石能疗，须诊察由以平之。”治疗上重视心理摄生，主张七情无忧，清虚恬静，使心神安泰，并提出“抑性预治”，都是较有创见之论。他对郁证论治尤有见地，认为“人身诸病多生于郁”。

张从正对情志病有许多独特见解，是金元时期治疗情志病的杰出代表。他系统讨论了《黄帝内经》中有关情志病的理论。在《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中归纳了怒、喜、悲、惊、思之气的病证，并对《黄帝内经》情志五行相胜之理进行了发挥，提出运用以情胜情的方法治疗情志疾病，他说：“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褒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忘此之言夺之。”对于《黄帝内经》“惊者平之”，他理解为使其平常之，认为惊者从外入，以其忽然而遇之，使习见习闻，则不惊矣。

明代医家对情志病的认识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广度。张景岳、吴崑、李中梓、孙一奎等都有较深刻的认识且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吴崑在《医方考》中指出：“情志过激，非药可愈，顺以胜情，《黄帝内经》一言，百代宗之，是无形之药也。”

张景岳采用“从类分门，附意阐发”的研究方法整理《黄帝内经》^[9]。除在各有关情志的条文后加以阐释之外，还专门详论“情志九气”，设立《情志病》专篇，其间体现着张景岳对情志的深刻认识，具有鲜明的脏情相关学术思想。他根据《素问·宣明五气》中“精气并于脾则畏”之说，认为情除了喜、怒、思、忧、恐之外，尚有惊、悲、畏，较之七情多了“畏”。张景岳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和《黄帝内经》，提出了“五志互病”之说。他在《类经·疾病类·情志九气》中指出：心肺皆主于喜；肝胆心肾皆能病怒；心脾皆可病于思；心肺肝脾皆能病于忧；心肾肝脾胃皆主于恐，并进行了详细论述^{[9]264}。张景岳发前人所未发，将阴阳五行与五志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他在《类经图翼·运气·五行统论》里指出“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9]624}，“五者之中，五五二十五，而复有互藏之妙也”^{[9]625}。五行互藏，则五脏亦然，故《景岳全书·妇人规·崩淋经漏不止》又说：“五脏之中皆有神气、皆有肺气、皆有肝气、皆有肾气”，“五

脏互移,精气相错”^{[9]1345}。他全面总结《黄帝内经》对五志的论述,在五志各有其分属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五志尚有互通为病且皆主于心。在《类经·九气》中指出:“情志之伤,虽五脏各有所属,然求其所由,则无不从心而发。……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惟心所使也。”^{[9]264-265} 在传统的脏腑与情志之间单一对应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多情可共伤一脏、情志损伤亦可由一脏而牵连其他脏腑的思想,对脏腑情志的生理病理关系认识得更为深刻,更好地体现了中医所特有的整体观念。

清代医家对情志病的认识内容非常丰富,涉猎更加广泛,情志学说得到了普遍应用。林珮琴《类证治裁》和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明确指出精神治疗在情志病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人有病在七情者,非药石可治,还当以情治之”。此外,《医宗金鉴》、《沈氏尊生书》等医书中,也收集了不少情志病治疗验案。清代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指出:“吾谓凡治内侍者,必先祝由,详告以病之所由来,使患者知之,而不敢再犯,又必细体变风变雅,曲察劳人思妇之隐情,婉言以开导之,重言以振惊之,危言以惊惧之,必

使之心悦诚服,而后可以奏效如神”。

参考文献

- [1] 杨鑫辉. 中国传统心理治疗探讨[J]. 南京师大(社会科学版)学报, 1995, (4): 55.
- [2] 何文彬. 《黄帝内经》情志致病理论及对后世的影响[J].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 2000, 24(5): 18-19.
- [3] 马月香. 中医防治情志病证理论源流初探[J].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9, 10(4): 7-8.
- [4] 王米渠. 中国古代医学[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193.
- [5] 吕直. 孙思邈论养性摄生及五脏情志病治[J]. 天津中医药, 2003, 20(1): 62-64.
- [6] 车离. 中国医学史略[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88.
- [7] 陈道瑾. 中国医学史[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22.
- [8] 郝志, 姜桂宁, 王君. 浅析朱丹溪对情志病的认识[J]. 山东中医杂志, 2010, 29(5): 299-300.
- [9] 李志庸. 张景岳医学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收稿日期: 2011-02-10; 修回日期: 2011-03-12)

[编辑: 李 巍]

对中医皮肤病学教学的几点思考

徐 萍 魏跃钢* 郭 顺 张恩虎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莫愁湖东路 16 号 1109, 210029)

* 通讯作者: weiyuegang@163.com, (025)86617141 转 30716

[摘 要] 中医皮肤病学是中医外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医皮肤病学课程建设的意义、中医皮肤病学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实践教学环节安排、如何保持课程的中医特色及中医皮肤病学教学面临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思考, 提出以课程建设的标准来建设中医皮肤病学, 进一步提高中医皮肤病学及中医外科学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 中医皮肤病学; 教学; 中医外科学

中医皮肤病学作为中医外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历代医家不断地实践与总结, 已经具有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理论体系。因此, 在中医外科学课程教学中, 不能仅把中医皮肤病学简单理解成为中医外科学中的一个章节, 而是应该当作一门相对独立的课程进行教学研究与经验总结。我们结合多年的中医皮肤病学教学经历, 有如下几点思考。

1 中医皮肤病学课程建设的意义

目前我国高等中医院校本科各专业中, 中医皮肤病相关内容主要归附于中医外科学课程中, 除个别选修课及研究生课程外, 很少有将中医皮肤病学

设置成一门独立的专业课程。因此, 中医皮肤病学课程建设可以理解为整门中医外科学课程建设中的一部分, 也就是按照精品课程建设的要求把中医外科学中皮肤病学部分当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单元来进行课程建设, 这将有利于推动整个中医外科学课程建设的水平, 提高中医外科学的教学质量。

2 中医皮肤病学教学内容安排

一般来说, 中医皮肤病学的课时分配相对较少, 这就需要合理选择和安排教学内容, 用相对较少的课时来达到教学目标。因此在课程的教学内容方面要与临床实际相结合, 对部分内容进行一些调整, 教